

社会资本与区域金融发展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俊生, 曾亚敏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以中国省际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各地区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相对优势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依然显著。

关键词: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5;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4-0037-09

一、社会资本概念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使用的分析工具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工具的丰富并未能很好地解释如下一个现象:即为什么拥有相似自然资源禀赋和物质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异(Grootaert 和 Bastelaer, 2002)。20世纪60年代,以Becker(1962)、Schultz(1963)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意识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也意义重大。但人力资本仍只能部分地解释增长源泉。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日益开始重视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另一项资本: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其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都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出了贡献,无论是韦伯的“强制性信任”,齐美尔的“互惠交换”,还是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都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研究的滥觞。但是,现代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建构则主要归功于Bourdieu, Coleman 以及Putnam三位学者。按照Putnam的定义,所谓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①因此,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相互信赖、互惠互利、公民心与社会关系等方面。

收稿日期:2005-10-10

作者简介:张俊生(1975—),男,河北秦皇岛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研究与发展中心博士生;

曾亚敏(1979—),女,湖南安乡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开始注意到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被认为是通过信息的分享,互惠互利的集体行动和决策制度来实现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进群体之间的信任水平提高经济效率(Guiso等,2001),在社会资本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信赖的程度会较高,人们更依赖彼此之间的诺言。例如,纽约从事珠宝生意的犹太人不签订任何合同,而单靠彼此之间的信任实施交易。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ukuyama)(1995)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了作为社会资本重要构成之一的信任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他认为,高信任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通常造就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例如教会、商会、工会、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等等。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如果缺乏此类中间组织,那么社会形态则会近似呈现出“马鞍型”,即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则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福山认为,无力营造一般意义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由此福山推出信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重要关系。从其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的名称亦可见其文的主旨。福山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以及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和美国则属于高信任文化。

后续的经验研究也大多证实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差异具有解释力。例如,Helliwell和Putnam(1995)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上的差异导致了意大利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La Porta等(1997)以及Knack和Kefer(1996)使用《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证实:在信任度较高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会较低;大企业的规模与收入无关而与人们之间的信任正相关,与家庭之间的信任度负相关。Knack和Kefer(1996)的实证研究则提出,信任度每提高12个百分点,年收入增长近1个百分点。此外,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研究表明,信任度的不同是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意义

在Putnam看来,一个依赖普遍信任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这正如货币交换比物物交换更有效率一样。而货币交换替代物物交换本身就是金融发展的巨大飞跃,此项进步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信任在社会中的普遍确立。

从Schumpeter(1911)到Goldsmith(1969)、MaKinnon(1973)、Shaw(1973)再到现在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乃至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呢?此项研究仍存在探寻的空间。最近,Rajan和Zingales(1998)从政治发展的角度,La Porta等(1997)从法律渊源上做出了解释,Stultz(2003)从文化发展上给出了说明,而

Guiso 等(2001)则认为,“既然金融契约就是一项高信任聚集的契约,那么社会资本应当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对意大利的研究证实,社会资本上的差异的确是意大利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事实上,金融的实质就在于以今日的钱财换取一个将来获得更多钱财的承诺。此项交易发生与否不仅取决于契约的法律执行力上,而且依赖于借贷者对融资者的信任。因此,社会资本作为决定信任度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必然会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对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而且能对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巨大差异作出解释。

中国作为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福山,1995),由于地域上的广袤和地区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信任度在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不同(张维迎、柯荣柱,2002),因此有理由认为,社会资本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各地金融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为此,本文以中国各省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各地区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做研究可以较好地控制法律等共有的制度性因素,可以尽量避免跨国研究所受到的制度性因素差异对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上的差异(主客观两种评价指标,即被他人信任的程度和公民心的体现)对各省的保险、有价证券以及个人信贷等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选取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直接测量即便并非不可能,但也确实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如果为了进行实证研究,则必需其他替代指标。但遗憾的是,学术界迄今还未能找到大家一致认可的指标。一般使用的指标包括:信任指数(Isham 和 Kahkonen,2003);关系数量和关系类型(Fafchamps 和 Minten,2003);文化组织数量(Helliwell 和 Putnam,1995)等等。以 Putnam(1993)为代表的政治学家主要是通过对一个地区居民公德心的测度来度量社会资本。通常使用的作为公德心的指标包括:选举的参与率、对社会团体组织的热衷度以及慈善事业水平等等。Guiso 等(2001)在研究意大利社会资本的时候也是通过选举的参与情况和无偿献血情况来间接度量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

本文的主旨是实证性研究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度量。在社会资本的度量上,本文选取如下两个替代指标: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以及对各地区守信用程度的调查。

使用无偿献血率被认为可以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的公德心或者所谓的公民精神,这在 Guiso 等(2001)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过应用。本文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无偿献血情况的统计来自“中国输血协会”(www.csbt.org.cn)

的数据。中国输血协会的数据主要以 2000 年除西藏自治区之外的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主。其数据包括了各地区当年献血总人次、献血总量、计划无偿献血与自愿无偿献血等数据。其中,自愿无偿献血应当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公德心,为此,本文以自愿无偿献血率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之一。

第二个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是信任。信任是度量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指标,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这是因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表明,高社会资本与高信任度相关联,即便社会资本仅仅反映了一个社区的道德态度(例如, Banfield, 1958; Fukuyama, 1995)。但对信任的度量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的。世界范围内代表性的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系统等。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 2000 年对中国大陆 15 000 家企业做了信任度调查,据此对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信用度作了排名。本文借用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数据度量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信任度。

在度量金融发展上,本文参照 Guiso 等(2001)对意大利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选择指标。第一项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储蓄的占比;第二项指标是保险占当年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第三项指标是购置有价证券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第四项指标是个人信贷的发展情况。上述对金融发展度量的数据都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的选取: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自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尽可能控制其他变量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更有效地度量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加入如下控制变量:用各省市自治区人均 GDP 表示经济发展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取自然对数);用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表示教育水平。这两项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地人口数据来自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此两项控制变量可能会低估社会资本的作用,这是因为一如 Putnam(1993)所指出的,社会资本远非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而事实上是经济现代化的前奏。因此,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可能部分地反映到这两项控制变量上去了。

对上述三组变量,即社会资本变量、金融发展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由表 1 统计结果可见,中国大陆在经济、金融以及教育发展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地区性差异,但社会资本分布在各省之间的差距更大。获得他人的信任程度(反映在信任得分上)与民众的公德心(体现在无偿献血率上)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分别达到 50 多倍和 270 多倍。这样大的差距一方面可能是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反向地会对经济、教育与金融发展等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注重分析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代表符号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资本变量：					
无偿献血率(万分率)	BD	11.76	7.13	0.19	51.97
信任度加权得分	TRUST	39.32	53.11	4.1	218.9
金融发展变量：					
储蓄(%)	DEP	19.86	5.04	12.33	30.40
有价证券(%)	SECU	0.63	0.89	0.02	4.88
非储蓄性保险(%)	NDI	1.80	0.85	0.51	4.44
个人信贷(%)	PLO	1.16	0.81	0.01	3.40
控制变量：					
人均 GDP(元)	PGDP	9 512.87	7 247.47	2 895	37 382
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EDU	3.49	1.83	2.10	11.93

注：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损，因此样本总数为 30 个；金融发展各变量均是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资本与银行储蓄。银行一直是中国居民与金融机构发生业务的主要中介。即便是在金融投资渠道有所丰富的今天，银行储蓄仍是普通居民处理暂时闲余资产的主要方式。这从 1996 年以来的 7 次降息仍不能阻止储蓄存款的巨额攀升中可见一斑。银行储蓄对中国普通居民而言充当安全保障的功能。同时这很大程度上又是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衍生出的对政府的信任，即对政府不会让银行破产的预期信任。

表 2 社会资本与银行储蓄之间的关系

	(1)	(2)	(3)	(4)
截距	20.027*** (10.953)	20.101*** (17.193)	12.571* (1.731)	15.380** (1.986)
BD	-1.397 (-0.105)		-2.991 (-0.214)	
TRUST		-0.006 (-0.340)		0.003 (0.103)
PGDP			1.187 (0.570)	0.819 (0.267)
EDU			-86.285 (-1.375)	-86.170 (-1.343)
调整 R ²	-0.035	-0.031	-0.037	-0.039

注：括号中为 t 值，* 代表 10% 水平显著，** 代表 5% 水平显著，*** 代表 1% 水平显著（以下同）。

由表 2 回归结果看，无论是作为社会资本表征量的无偿献血率(BD)、信任加权得分(TRUST)，抑或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均 GDP(PGDP)、教育水平(EDU)都不能对各地区的银行储蓄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只有截距具有显著的解释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具有一个最低的恒定水平，不会因为地区差异而产生很大的不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与改革相伴的制度变迁下，居民对未来的收入水平的预期能力下降，增加当期储蓄是保障未

来收入安全的重要方式之一,即便是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亦不能很强地改变储蓄水平。

(二)社会资本与保险。中国大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以来,由原有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发展为 50 余家中外保险企业激烈竞争。截至 2003 年底,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收入)与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当年 GDP 的比率)分别为 127.7 元人民币和 1.8%,这与世界平均水平的 360 美元与 7%存在不小差距。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这从表 1 中可见一斑。

表 3 社会资本与保险之间的关系

	(1)	(2)	(3)	(4)
截距	1.379*** (4.714)	1.422*** (9.071)	-4.354* (-1.717)	1.394** (0.387)
BD	3.573* (1.772)		2.211* (1.689)	
TRUST		0.010*** (4.0040)		0.010** (2.268)
PGDP			0.364** (2.127)	0.200 (0.047)
EDU			0.777 (0.084)	-5.315 (-0.602)
调整 R ²	0.058	0.341	0.198	0.301

保险业的有效发展需要完善的诚信制度,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保险业发展存在的差距。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见表 3),作为社会资本变量的自愿无偿献血率和信任评分都对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起到正向的显著解释作用。在加入人均 GDP 与教育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变量的解释能力仍然十分显著。统计上的关系证实了保险业的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因素外,诚信制度的建设必不可少,毕竟诚信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之一。一方面,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即有效解决投保容易、理赔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信任,即有效解决骗保等道德风险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有价证券。中国大陆居民有价证券持有的形式主要包括国库券、企业债券与股票等。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运作,中国居民持有有价证券量不断增加。以股票市场为例,迄今上海和深圳两市的市值达到 5 万亿元左右,占 GDP 的 50%以上,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 7 000 多万户。有价证券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体现。但是,表 1 描述性统计显示,有价证券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最高的上海(4.88%)与最低的海南(0.02%)差距达到 200 余倍,显示出巨大的不平衡。

从表 4 的回归结果来看,表示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均能对有价证券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结果在加入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后依然显著。这表明,有价证券作为一种高信任聚集的契约,其广泛使用需要得到社会资本的支持。

表 4 社会资本与有价证券之间的关系

	(1)	(2)	(3)	(4)
截距	0.074 (0.247)	0.202 (1.289)	-6.026** (-2.333)	1.425 (0.402)
BD	4.733** (2.173)		3.288* (1.701)	
TRUST		0.011*** (4.553)		0.014*** (3.036)
PGDP			0.703** (2.246)	-0.112 (-0.272)
EDU			-1.078 (-0.114)	-9.295 (-1.073)
调整 R ²	0.114	0.405	0.246	0.391

(四)社会资本与个人信贷。20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陆续开展了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助学贷款等个人信贷业务。但是,个人信贷业务在结构上与地区发展上都存在着不平衡,结构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仍以住房贷款为主,地区不平衡上可以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略见一斑。

表 5 社会资本与个人信贷发展之间的关系

	(1)	(2)	(3)	(4)
截距	0.662** (2.436)	0.810*** (5.865)	0.193 (0.075)	-0.984 (-0.309)
BD	4.216** (2.120)		4.081* (1.849)	
TRUST		0.005** (2.586)		0.004* (1.784)
PGDP			0.018 (0.059)	0.215 (0.567)
EDU			9.118 (0.969)	-2.382 (-0.306)
调整 R ²	0.108	0.164	0.090	0.112

一般认为,制约个人信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还贷人的信用问题。以助学贷款为例,自1999年8月在全国8个城市试点助学贷款以来,迄今已经发放40余亿元人民币。但拖欠归还助学贷款的问题已逐渐显现出来。据调查,北京工商银行助学贷款,拖欠比例达到10%,长沙某大学的拖欠比例甚至达到35%(张燕清,2003)。这种情况使得很多银行对助学贷款的态度如食鸡肋,高比例的贷款归还拖欠率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本文的回归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地区居民受信任的程度以及公德心都对该地区的个人信贷发展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见表5)。在社会资本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个人信贷的发展也要相对地好一些。

五、结论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日益开始重视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的中国省际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信任程度越高的省份以及在公德心越

强的省份,居民在金融资产上的投入比例会越高。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

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有如下启示:首先,要促进金融发展除了继续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设,有力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外,恢复和重建遭到文革破坏的社会资本(张维迎、柯荣柱,2002)同样重要。这是因为,虽然社会资本不能完全替代契约和法律,但是高强度的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促进合适的交易实现,有助于协商签订合同。如果信任仅存在于家庭之中的话,资本市场和高级经理人市场的结构就会十分有限,从而可能制约私有企业的发展规模,进而制约金融发展。

其次,保护与发展社会资本,尤其是恢复民众之间的信任,增强民众的公德心乃是保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之一。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得到巨大的增强,物质资本不断丰富,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目睹民众间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等传统美德的弱化。欺诈、造假在个人、企业、组织乃至政府部门中都有所存在,其中部分原因是社会资本的萎缩。

社会资本存量具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社会资本的形成为未来充分和连续性的合作。但是,社会资本建立起来并发挥功用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社会资本一旦遭到破坏便很难再生。加之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其产品固有的外部性不能得到完全的内部化,因此,社会资本将出现产出不足的情况。社会资本的潜在功能,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内驱力,在无形的积累、运作和交换中发挥经济效益的。小心维护并积极增进社会资本将是我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注释:

- ①社会资本在社会学中最初被定义为,人们由于归属特定团体而具有的优势和机会(Bourdieu,1985)。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不断细化,按照研究对象划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微观层次研究社会成本的代表性学者是Putnam(1993),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诸如个体的家庭网络这类社会组织以及有关的规范和价值观,并将焦点放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Coleman(1990)则从中观层次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分析,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系列实体,这些实体都具有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并且能促进结构的内部参与者行使某种行为。该定义着重分析的是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拘泥于个体之间关系;North(1990)和Olson(1987)的研究则可以看作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社会资本,他们认为制度,包括制度关系与制度结构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增长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Becker, G.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70,9~49.
[2]Goldsmith, R.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Grootaert, C, Bastelaer, T.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 [4]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R]. Working paper, 2001.
- [5]Helliwell, J, Putnam, R.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Italy[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1995, 21,295~311.
- [6]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ut?: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2,1251~1288.
- [7]King, R, 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3, 108,717~738.
- [8]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333~338.
- [9]La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52,1131~1150.
- [10]McKinnon, R.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 [11]Putnam, R. Mar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2]Rajan, R, Zingales, L.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 88,559~587.
- [13]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海南:海南人民出版社,2002.
- [14]张维迎,柯荣柱.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2002,(10).
- [15]张燕清. 从助学贷款看大学生信用教育[J]. 教育评论,2003,(5).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ZHANG Jun-sheng, ZENG Ya-mi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en after adding the controlled variable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rust

(责任编辑 许波)